

中國大眾傳播事業的回顧與前瞻(上)

賴光臨

壹、前言

一部中國大眾傳播事業史，空間廣袤，時間綿長，要作一回顧與前瞻，是一極為艱難的事。

惟本文寫作，不在繁雜史實的敘述，而重在探討中國大眾傳播事業的特色與貢獻，由之認識此一事業的特質與精神。

從時間上看，中國大眾傳播事業發展經歷二千餘年，然近代報業出現之前，報紙無採訪，無評論，只轉錄諭旨章奏，猶似政府公報，與社會大眾無密切關係。

近代報章創立，至是大眾傳播事業獲得發展，並發揮深遠影響。當時民智的啓迪、憲政思潮的激發、西方文化的輸入、民族主義思想的激揚，都賴於報章的導引促進，並形成風潮。

民國成立，開展了大眾傳播事業的新時代，社會的觀感煥然改觀，國家的大法給予尊重與保障，而報人抱持民主信仰，開拓了傳播事業的新理念。

這一時期，新的電子媒介出現，通訊社事業發皇，拓展了傳播事業的時空領域。而獨立報業則樹立了文人論政的新模式。

及至中央政府退處臺灣，大眾傳播事業經初期筆路藍縷奮鬥，隨著經濟起飛社會繁榮，以及教育的普及與提高，轉而蓬勃發展，並在發行與廣告上，締創了有史以來的最高紀錄。

現代傳播事業對社會影響力日深，所作的貢獻與產生的問題，值得吾

人注意與探討。

八十年代，科技神速的發展，新媒介出現並對社會產生衝擊，傳播事業面臨更激烈的競爭。惟無論科技如何進步，大眾傳播事業有其永不可變的特質，只有這一特質，才能保證傳播事業之受大眾的尊敬。

本文承行政院建立有線電視系統工作小組邀約撰寫，以時間匆促，諸多疏漏，有待高明指正。

貳、中國大眾傳播事業的發軔

一、最早的報紙

羅馬愷撒執政時期，將政府重大事項按日揭示於議事廳。至紀元前六年，有每日紀聞 (Acta Diurna) 發行，被認為是西方最早的報紙。

此一時期，值中國漢朝宣帝在位，有潁川太守黃霸，將皇帝詔諭在衙門前公布。這項舉措，獲得皇帝的稱揚，說他「宣布詔令，百姓鄉化。」(註一) 哀帝建平元年(紀元前六年)，有府吏私抄丞相章奏，在大街上公開發行。(註二)

古代報紙的發生，東西方在時間上非常的巧合。

中國報紙出現伊始，便向兩途發展，一是官方的邸報，起源於漢初(註三)。高祖立郡國之制，各國在京城設邸，從事「通奏報」，這種報條稱為邸報，用以傳達君臣間消息。另一是私人發行，一如上述府吏私抄章奏，民間傳寫流佈。人類生來具有求知的慾望與好奇心，對於公眾關心的

消息，常是一傳十，十傳百的無遠弗屆的散播。見之文字，這應是「民報」的濫觴。

中國傳播事業在早期歷史進程中獲得發展，藉助於下述兩事：

一是朝廷按日發布政事。根據記載，唐代開元至大中一百三十餘年間，朝廷政事日見條報，成爲一項慣例（註四）。到了宋代，朝廷設立都進奏院作統一發報機構，從各州鎮二百餘名進奏知後官中，選出一百五十名，正式稱爲進奏官，集中一起辦公，抄錄承發文報（註五），儼然是國家的一種制度。因此，唐宋以後，邸報發展成爲大眾獲知新聞的主要媒介。

二是印刷術用以印報。報紙印刷一事，有說始於唐代，只是無法確證。宋代報紙以手抄爲主，但已見印刷，這有兩種情形：一是朝廷重要詔令，爲免抄錄錯誤，與避免稽誤；或賞功罰罪，可資懲勸的；都作鏤板宣布（註六）。二是私人將重要新聞刻印出售（註七）。畢昇曾發明活字板，用膠泥燒成，至明代，被報紙所利用，時在崇禎十一年（公元一六三八年）（註八）。手抄費時，改用活板配印，能省時與大量發行。清代京報已一式活字板印刷，是歷代以來所確見的一種印刷報紙。

根據前人記述，當時印刷的京報，一式用活字板印刷，所有的字都用膠泥燒成，字粗而歪斜不正，印刷時用平常鍋煤煙子加膠水，有很難聞的臭味。所用的紙是一種極薄的俗稱的薄川蓮。報的形式，長七、八寸，寬三寸餘，都是單篇，每冊五、六頁至十一頁，每頁八行，每行十三字。黃色紙皮，近首印紅色「京報」兩字，下邊寫某某報房（註九）。

二、報業落後原因

就東西方報業發展論，中國報業顯然落後，分析其中主要原因，或有兩端：

一是政治上形格勢禁。專制政體於國家政事，重祕密而禁洩漏，所以自漢至清二千年間，報刊材料來源，概由官署發抄，缺乏專職記者的採訪，結果造成「向行邸報，大抵例摺居多」，「朝章國典，罕有講求」，影響官報的品質。

然歷代朝政洩漏在所難免，宋代有所謂內探、省探、衙探一類人，打

聽內廷官府消息，以小紙書寫，飛報遠近，稱爲小報。但受到朝廷嚴令禁止，宋孝宗時並制定一套保甲法，限令進奏官五人連保相互監視，一人犯禁，四人連坐，最高刑罰，可編管五百里（註十）。在政治壓抑下，民營報業亦不發達。

中國古代原重視輿論，以君主對人民負有上天給予的司牧責任，不能意氣自用，虐民以逞。而天意又輒借民意體現，這是中國古代的政治理念。從政治的實際利害言，民意亦無法扼制。召公勸告厲王勿事監諛，因爲「防民之口，甚於防川，水壅而潰，傷民必多，民亦如之。故爲水者決之使導，爲民者宣之使言。」（註十一）這是一篇擲地有聲的言論自由文獻。只是自秦以後，政尚專制，皇帝獨尊，言禁甚嚴，二千年間從未有人以報刊爲工具，發表對朝政國事的意見。

二是報業人才缺乏。中國近代報業出現之前，無所謂「報人」。漢代以來，邸吏利用抄錄承發公文函牘之便，私抄外洩。宋代的內探、省探、衙探一類人，也是進奏院的邸吏。有清一代，則有商人在京城設立報房出版京報，刊印內閣公開發抄的章奏令諭。利之所趨，許多負販西北的商人，都以此爲「副業」。

這些人的身份，在社會上並不高貴。而賣報的人，則是雜役之流，售時以籮隨行，舉動猥鄙。因而，發行報紙被視爲「賣朝報」的變相，成爲社會輕賤的行業（註十二）。而「朝報」一詞最早見於宋代，則這種社會的鄙視，可能已有相當長久的時日。

在近代報業產生之後，也曾有知識分子投入。在華西方傳教士及商人創辦華文報刊，文義欠通，辭不雅馴，因僱用中國文人擔任編輯與主筆。而這些文人，多在考場失意，流於疏狂落拓，主持報刊，不過「發抒其抑鬱無聊之意興而已。」而社會亦輕視他們。滿清大吏左宗棠甚至有「江浙無賴文人，以報館主筆爲之末路」的話。（註十三）

梁啟超亦痛陳報界中人，「思想淺陋，學識迂愚，才力薄弱，無思易天下之心，無自張其軍之力。」是爲報界的「病根之根」。（註十四）是故「政治」與「人才」兩項，限制了中國報業發展達兩千年。

參、近代大眾傳播事業的興起

一、知識分子參與報業的背景

中國大眾傳播事業的發展，在優秀知識份子參與之後，其中的契機，為下述兩事：

一國勢衰頹，外侮日迫。尤以甲午一役，泱泱大國，敗於蕞爾島國日本之手。馬關議和，割臺灣，失朝鮮，賠款二百兆，創巨深痛，震動了全國人心。

最為激昂慷慨的便是知識份子。唐才常、譚嗣同想到馬關條約的遺害甚大，常常通宵失眠，熱血盈腔，哭泣不已（註十五）。梁啟超的詩云：「悵飲且浩歌，血淚勿盈臆。哀哉衣冠儔，塗炭將何極。」（註十六）同見滿腔悲憤。

汪康年時任兩湖書院分教，見「時機急迫，非可縮蓄」，於是向張之洞堅辭職務，要到商業都市籌設報社。（註十七）

這些有識之士，抱持一種想法：非變法不足以圖存，非將政治教育一切大經大法，改弦易轍，又不足以變法；只是自己無法透過政治權力運作、以展布理想，因而只有出版報刊以昌言此義，作為聲應氣求集合同人的樞紐。

二報業已受知識份子的重視。他們不再鄙視報紙為洋商的一種行業，開始有了新的認識。

康有為上書言變法，即主張「設報達聰」，要清廷令直省要郡各開報館，州縣鄉鎮亦令續開，並日月進呈，備數十副本發各衙門公覽。認其效果，能「民隱咸達，官憲皆知」，由此突破上下之間的「蔽隔」。（註十八）

維新人士都具有這份認知，強調報章的作用為「去塞求通」。上下相通，故有宣德達情之效；內外互通，故有知己知彼之能。若下情壅塞，有利而不知與，有弊而不知去，則國必弱。若昧於外情，坐井而以為天小，捫籥而以為日圓，則國必危。報章儼然成為立國的要務。

及至戊戌政變之後，維新人士逃亡海外；而留學風氣漸興，青年相率求學日本，咸接受西方知識洗禮，以報刊為傳播聲氣的利器，肯定報業作用，是薈萃全國人思想言論一一介紹之於國民，不止是國家的耳目喉舌，而且也是人羣之鏡，現在之糧，將來之燈。對報章的重視，迥非昔比。

二、近代報業的特色

由於優秀知識份子的參與，報業的精神體貌煥然一新。而知識份子的特質滲入其中蔚成特色，舉犖大者如：

一是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國士精神：知識份子有一份入世襟懷，將家事、國事、天下事一把提起。宋代范仲淹「岳陽樓記」中有一段著名的文字：「嗟夫！予嘗求古仁人之心，……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，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，是進亦憂，退亦憂，然則何時而樂耶？其必曰：『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』乎？噫！微斯人，吾誰與歸？」這份兼善天下的態度與志懷，前人影響後人，寢假成為知識份子的高貴傳統。甲午（一八九四年）之後，知識份子懷具國亡無日的沈痛心情，致力於辦報，無形中將這一高貴傳統移植於報業。

二是強調專業道德信守：舊時報章記者常閉門以造，信口以談；論說則毀譽一憑恩怨，甚至「颺頌權貴，為曳裙之階梯；指斥豪富，作苞苴之左券。」所為所行，令人不齒。

知識份子明瞭報章勢力的不可輕侮，責任的艱巨，因而對自己從事的事業凜然生畏敬之感，所以立言紀事，特重「保其為社會所信仰」，以求自保令譽，自尊人格，自重價值。

道德信守為現代專業的要件，用以建立是非判斷的標準。新聞學者指出，新聞倫理道德的宏揚，具有雙重目標：一是維護自由，一是擔當責任。而自由與責任，為新聞事業生存與發展的基石。知識份子以高尚人格滲入報章之中，形成光輝耀射的報格，反映了新聞學者所揭櫫的專業道德理想。

三、知識份子角色提昇

知識份子參與報業，毫無疑問應是一件歷史性的大事，因其本身的性格與社會角色，亦由是轉變。

傳統知識份子素來嚮往於政治事功，致力於仕進，以「得君行道」為最大期望。清末維新首領康有為，先後向光緒皇帝上書七次，總要獲得君君的賞識才罷手，這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。唯仕途壅塞，天威難測，得君行道實非易事，知識份子的理想追求，常不免遭遇挫折。

英哲羅素指出，中國知識份子不是犬儒主義者。傳統士人對當政者的諫靜，被視為是一種「天」所賦予的責任。這項責任感，一依道德理性而發，甚至於罔顧一己的安危後果。中國士人重道統，欲求駕凌治統之上，這是所表現積極精神的一面。

然傳統士人為取得政治地位，或仗貴族援引，或靠皇帝知遇。具有強烈的依附性。能站起來為道統說話的，仍限於極少數。而且，士人對政治的反應，還有退隱一途。所謂「達則兼善天下，窮則獨善其身，」所以知識份子的歷史性格，在積極中隱伏著消極。

知識份子與報業結合，以發揚民意、啓迪民智為務，轉而向下著力，遂開濶了自己的視野與胸襟，及服務社會的新途徑。知識份子藉傳播媒介盪激聲氣，突破時空局限，對大眾產生衝激與影響，力量的宏大，是歷史上空前的，知識份子獲得新憑藉，超越仕途，擔任了更重要的社會角色。

近代報人負有監督政府的責任，對公眾機構作批評與建議。報人不問窮達，亦無所謂窮達，終生站在崗位上就業自守，對國事具一貫的積極態度。而新聞事業重自由，報人與政治權力保持一距離，以維護獨立身份，比之傳統士人，在性格上具自主，精神意氣上乃有一大躍進。

四、近代報業的貢獻

報業自產生脫胎換骨的轉變，由是發揮功能，對近代政治鼎革與社會變遷，產生推動與促進之力。現將其影響及貢獻，分述於后：

一是啓迪民智：時社會風氣閉塞，民智愚陋。梁啟超曾將國人知識水準，分成幾個等級，能識字的，全國不滿五千萬人；能執筆成文的，不滿五萬人；能讀經史略知古今之事的，不滿五千人；能知政學本原考人羣條理

的，不滿百數十人。（註十九）

民智未進，風氣未開，自無法求政治的革新進步。

因而，知識份子辦報，重視對大眾的教育作用，強調思想新而正，材料富而當，要將世界新思想、新觀念、新知識貢獻於同胞之前。

報刊成了教育大眾的工具，成為提供新知的源泉。唐才常說，讀報刊「不啻購千萬祕籍，萃什佰良師益友於其案側也。」（註二十）即是對報刊教育功能的肯定。

梁啟超指出當時報刊開發民智的效果：「牖一室外窺，則燦然者皆昔所未睹。」於是「一孔之士，山澤之農，始知有神州；筐篋之吏，烟霧之儒，始知有時局。」（註二一）眼界開濶，觀念轉新，導致傳統社會逐漸改變。

二、激發民主憲政思潮：中國之民本思想，與西方民權思想不同。士大夫聞西方自由之說，為之觸舌驚怖。汪康年辦時務報，撰「論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」一文，強調「天下之權勢出於一則弱，出於億兆人則強。」（註二二）傾駭國人耳目。他的朋友高夢且致書勸戒說：「風氣初開，民智未出，且中國以愚黔首為常，一旦驟聞此事，或生忌憚之心，而守舊之徒，更得所藉口以惑上聽。」（註二三）

從上所引述，見出中國由上至下，於民權思想極為生疏。

唯自經報刊闡發民權緒論，特別是一九〇五年，革命黨民報與保皇派新民叢報，就民權與君主立憲問題展開激烈論戰，於國民政治思想的開發與進步，助益最鉅。徐復蘇認為「誠足以開我數千年來政治學案之新紀元。」（註二四）

清廷於光緒卅四年（一九〇八年）下令各省一律成立諮議局，於是各省而有破天荒的法定民意機關，並開展一九一〇年的國會請願運動。

及至辛亥武昌起義，滿清王朝不旋踵間被推翻，二千年專制政體改為共和，民主憲政思想由涓涓細流，終於滙為澎湃浪潮。

自此之後，誠如中山先生所指出，「中國民主政治，已為國人所公認，復辟、帝制諸幻想，皆為得罪國人而不能存在。」（註二五）

因政論報刊的開發與倡導，使民主思想深植人心，印證了西哲的一句

名言：「使民主制度成爲可能的是新聞事業。」

三、輸入西方文化：西方文化的輸入中土，遠自明清之際，至道咸同光之間而進入另一階段。但以青年接受的熱度與廣度言，則在下列兩個時期：一爲光緒宣統之間，二爲「五四」運動前後。

這兩期輸入西學的方式，與道咸同光以前時期不同，道咸同光之際重在譯書，不惟西方傳教士致力從事，成立出版機構，如墨海書院、格致書院、文會館與廣學會，均譯印書籍；而且滿清政府所設機構，如同文館、廣方言館、江南製造局，亦大量繙譯西書。而光緒宣統以後兩時期則著力在藉重報刊譯介闡揚西學。

報刊的發行廣被，所散播的影響力，自較譯書爲大，蔣夢麟曾指出，當時青年以報刊爲新知識的源泉。

光緒宣統年間，梁啓超介紹西方文化最力。他在日本先後創辦清議報、新民叢報，以闡述東西學說輸入於中國，使讀者獲知世界種種知識爲主旨。他拋棄公羊孟子不講，專介紹盧騷、孟德斯鳩、達爾文、伯倫知理等西哲，紙貴洛陽，風靡海內外。其時留日學生多受激發，紛紛創辦報刊，幾無不有「譯述」、「譯叢」欄，以輸入內地文明爲天職。

梁啓超自稱他們是致力晚清西洋思想運動（註二六），只是他們不通西文，而西洋留學生未曾參與此項活動，受於能力限制，致所介紹西方學術，不免產生稗販、破碎、籠統、膚淺、錯誤諸弊，運動旋起旋落，未能得一健實的基礎。

「五四」運動前後時期，已見歐美留學生熱心參與，他們不僅僅是譯介西學，輸入西方文化；更積極的要「重新估價一切」（Transvaluation of Value），對傳統文化採取評判態度，專注思想文化的改革。時西方學說大量的介紹輸入，胡適闡釋杜威實驗主義，張申府介紹羅素，王國維譯述叔本華、尼采哲學，張君勱引進柏克森學說，李石曾介紹克魯泡特金，陳獨秀宣傳馬克思、恩格斯思想，李達宣揚列寧、布哈林……。於是實用主義、自由主義、個人主義、社會主義、無政府主義、共產主義……，雜然紛陳，使中國文化遭遇前所未有的最大衝擊與危機。

這些西方思想的傳播，無不藉助傳播媒介，其中最重要的是「新青年

」雜誌。民初西方文化的譯介輸入，與對傳統文化的評判，都由這一雜誌發動。而當時全國報刊，多達六百餘種。

四、激揚民族主義思想：滿清入主中國逾二百年，民族思想經長久時日的壓制，已行麻木。自甲午中日一役之後，孫中山先生起而倡導革命，以報刊作爲言論宣傳的機關，至是民族意識日益煥揚。而辛亥革命思潮，即以民族主義爲主流。

清末民族思想，以排滿爲目標。惟近代民族主義思潮，究非以種族革命爲旨歸，而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。中山先生提倡恢復民族道德與知能，而這些正表徵中華民族的精神，內則要求中華民族獨立平等，外則要求世界各民族獨立平等，不容許帝國主義壓迫。

民族主義思潮經報章鼓吹宣揚而開展，民國建立，以五族共和爲號召；惟國勢凌夷，列強侵略方興未艾，則反帝國主義思想澎湃激盪。抗日戰爭時期，大公報張季鸞說：「民族太偉大，而自己卻太渺小了，這兩年只勉力做到一點，就是，精神上將這一張報完全貢獻給國家。」（註二七）民族思想的昂奮，可見一斑。

註釋

註一：漢書，循吏傳。

註二：漢書，師丹傳：「……丹使吏書奏，吏私寫其草。丁傅子弟聞之，使人告丹上封事，行道人徧持其書。上以問將軍中朝臣，皆對

曰，忠臣不顯諫，大臣奏事不宜漏泄，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。」

註三：一般報史著作，謂邸報產生於漢武帝時代，實誤。邸之設置，早在高祖之世，如代王之邸稱代邸。代王被請進京登皇位（文帝）先入代邸議事。武帝實行削藩，侯國日益微弱消滅，政治局勢由貴族分封，復歸中央一統。所謂通奏報的邸已失去作用。（邸報產生年代請參閱拙作「新聞史」頁一〇—一一，允晨文化實業公司出版）

註四：孫樵經緯集「讀開元雜報」。孫樵寫這篇雜感，在宣宗大中五年。到長安「日見條報朝廷事者」。自開元算起，計一百三十餘年。

註五：王闓之澠水燕談錄。

註六：分見續資治通鑑，卷三六；宋會要職官二之四七。

註七：孫毓修中國雕版源流考，頁二。

註八：顧炎武亭林文集第三卷，頁十五。

註九：齊如山「清末京報瑣談」報學一卷三頁。

註一〇：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二四。

註十一：史記周本紀。

註十二：弋公振中國報學史，頁一〇一。

註十三：同上。

註十四：梁啓超「清議報一百冊祝辭」飲水室文集第三冊。

註十五：唐才常「瀏陽興算記」唐著覺顛冥齋內言卷四。

註十六：丁文江「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」頁二一。

註十七：汪詒年「汪穰卿先生年譜」。

註十八：梁啓超「戊戌政變記」附錄改革起原。

註十九：梁啓超「中國積弱溯源論」，飲水室文集第二冊。

註二〇：同註十五。

註二一：張文襄公全集內，頁三七三二。

註二二：時務報第九冊。

註二三：同註十七。

註二四：同註十六。

註二五：孫中山「中國革命史」，總理全書雜著頁四五七。

註二六：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，頁一〇一。

註二七：張季鸞「抗戰與報人」季鸞文存下冊頁一五三。

大學叢書

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(上、下冊)

賴光臨 著 定價二七〇元

本書分析近代報業創刊的背景，探討在社會各層面引發的影響，以窺視新聞事業在不同時期中擔任的角色及中國現代化的演進歷程。全書涵蓋了中國近代新聞史上每一重要環節，及報人盡瘁心力於報業的事功與信守。

新聞媒介・社會責任

潘家慶 著 定價九九元

旨在以新聞學中的「社會責任論」檢討七十年代台灣地區媒介的具體表演。同時，由「媒介社會學」的分析方法，找出新聞媒介問題的成因，並據以提出建議，兼具理論與實務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